

中国经济思想（二）

张文轩 主编

目 录

洪仁环的经济思想	1
魏源经济思想	8
严复经济思想	19
毛泽东经济思想	28
关心群众生活	28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31
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35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38
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轨迹	40
两参一改三结合	60
张闻天经济思想	62
陈云经济思想	74
我党卓越的经济专家	74
陈云与北满根据地建设	91
陈云提出新“八字方针”	94
邓小平经济思想	97
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	97
邓小平经济思想要点	107
邓小平关于非公有制经济重要论述	113
董辅初民营经济思想	142

洪仁玕的经济思想

洪仁玕(1822-1864 年),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广东花县人。1843 年与洪秀全共同创立了拜上帝会,宣传组织革命。1851 年,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时,他由于清军的围追堵截,未能投入太平军,后在亲友的帮助下,折回香港,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数等自然科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1854 年,他怀着满腔热情到达上海,准备转赴天京,投入他久已中断了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交通阻隔而未成。以后,他在上海、香港继续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数,“想学了本事,将来辅佐他(洪秀全)”。因此,“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他都“能知其秘钥所在”。1858 年,他不避艰险再次转赴天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于 1859 年春到达天京,实现了他贡献革命的平生之愿,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当时,太平天国经过天京事变正陷于危境,为了扭转局面,开创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洪仁玕提出了一个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主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中国。

洪仁玕的经济思想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兴起的“向西方学习”思潮的继续和发展。但由于洪仁玕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他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很早就参加了拜上帝教组织,从事反清革命斗争,后来又长期居住香港,学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较深。这就使他的思想超越了同时代的地主阶级思想家,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对西方资本主义的

认识较深，较为全面。

首先，十九世纪中期的这些先进的思想家，当他们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以后，都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主张，可是他们主张的只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对于社会政治，他们就觉得还是中国传统的封建道统好，所以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口号，对于社会政治则认为“可变者势，其不变者道而已”。冯桂芬所主张的也只是“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对于社会政治仍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容闳和王韬也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才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洪仁玕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先进思想家。

洪仁玕通过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接触和了解，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比清朝强盛，不光是由于“船坚炮利”，其中还有一层更深的奥秘，即有一套比清朝更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由法善也”。如美国，“有事各省总目公议，呈明决断。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则限月日，置一大柜在中廷，令见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招内，以多人举者为资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因此，要使得国家繁荣昌盛，不仅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必须有一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如沙皇俄国，学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邦法和火船技艺”，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的同时，“大兴政教”，以致“百余中来，声威日增”，终于成为“北方的冠冕之邦”。反之，如暹罗（今泰国），日本，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暹罗“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买，今亦变为富智之邦”。日本通过与西方国家的通商贸易，“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

出于巧矣”。但是这两个国家都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政治腐败，（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尚未发生）仍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以，他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只能使国家致富，要使国家致强还必须有先进的政治制度。从而他主张：要使中国独立富强，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

这里，洪仁玕已经朦胧认识到社会政治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密切联系。先进的社会政治能够推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反之，落后的社会制度阻碍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释，聃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甚；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此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这里，洪仁玕讲的虽然是宗教思想，实际是指各国的社会政教。

洪仁玕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思想主张，不仅反映了新兴的富商大贾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压制和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和愿望，同时把鸦片战争以后兴起的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创造了条件，奠定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始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但是，洪仁玕在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同时，却又坚持“中国纲常”。他在一首《谕民》诗中说：“中国纲常如未坠，军师安肯运军机”。主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守各礼”。当然，洪仁玕所坚持的“中国纲常”，决非传统的中国封建伦理，而是太平天

国拜上帝会的教义所规定的一系列礼仪制度。他在一篇《克敌诱惑论》中曾以了了数语概括了他所谓的“纲常”礼教：“敬天爱民之事，千万多为；忠主孝亲之忱，时刻不放”。当然太平天国的这些礼仪制度虽然采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其中也充斥了农民阶级的落后意识，不乏封建伦理内容，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烙印。

其次，在经济方面，十九世纪中期许多进步思想家也都主张发展近代工业。魏源提出了从军事生产进一步发展到民用生产的主张，说“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相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造”。冯桂芬也提出采用机器生产的主张，“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张。洪仁玕则是最早明确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进思想家。他通过与西方资本主义长期的接触和观察，已经发现并把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特征，然后根据这些特征提出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

一、他不仅提出了发展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主张全面发展各种企事业，如“兴车马之利”使用火船汽船，“兴器皿技艺”，制造“精奇利便”的日用百货；“兴宝藏”，开采煤、铁、五金、盐矿，分工业生产提供原料燃料；开办银行、“兴保人物之例”即人寿保险公司；立“邮亭”、“书信

馆”、“新闻馆”，以利商品货币的流通周转等等。所有这些企事业，除了为传递公文消息而设的“邮亭”而外，他主张都必须由私人投资，交纳一定的税金，注册营业。“富民纳饷，稟明而立”。即使象银行这样的金融业，也应该由具“百万家财”的“三四富民共请立”。

二、他主张这些企事业，都必须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开采矿山的，必须将“十分之二”的收入占为已有；银行家在“银货招易，或纸银相易”的存放汇兑中，允许其“每两取息三厘”。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各企事业的发展，洪仁玕还主张各企事业进行自由竞争，并实行专利制度，鼓励发明创造，“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任他人仿做”。

三、实行雇佣劳动制度。他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为了发展雇佣劳动制度，他制定了--系列政策措施，为雇佣劳动保证充足的劳动力市场。他规定“不得买奴”、“蓄(蓄)奴”；对贫穷无告的劳动人民“不得以奴视之”，收为奴婢；也不能对一贫如洗的劳动群众“施舍”救济，必须“宜令作工，以受其值”，“自养其身”，“自食其力”。他错误地认为如果对这些贫民“施舍”行善，只会养成他们的“游手偷闲”，减少劳动力市场，影响了雇佣劳动。

四、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是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所以，资本主义生产首先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发展的水平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洪仁玕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把商品经济作为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大兴交通运输是为了“大商搭客运货”；创办新闻馆是为了报导“物价低昂”，

以便“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创办银行为了周转资金“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创办保险公司为了“货物船舶有防于水火者”。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大利商贾士民”。为了促进商品生产，洪仁玕还主张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改变过去封建社会贱视和苛虐工商的传统陋习，把过去封建社会中排列在社会各阶级最后的工商，提高到首要的地位，“士农工商”变成了“商贾士农”。

此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洪仁玕还主张提倡消费，打破过去封建社会中对于礼仪服饰的等级制度，对于一切消费品的享受，除了那些极端奢侈浪费的“雕楼刻门”、“类及王宫朝殿”的宏伟建筑以外，都应该“任其财力自为”，并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对于发展资本主义成绩卓著者给予“总领”一类的爵位，以资鼓励。

私人投资、追求利润、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洪仁玕紧紧地把握住这些基本特征，提出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这说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已有较高的认识，也反映了富商大贾要求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共同愿望。但是，洪仁玕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对贫苦劳动群众进行救济“施舍”，把劳苦群众贫穷的原因说成是“游手好闲”，这又是错误的观点，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因为劳动群众的贫困根本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是由于官僚地主等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压迫所致。

第三、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强烈呼声。他们感到，在这“诸国同时并域”的时代，西方国家“独能自致富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科学技术先进，

“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多中人所不及”。因此，大讲西学，“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为了推动科学文化的发展，他们严厉地批判了封建顽固派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作“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洪仁玕继承了这些先进思想家的进步主张，积极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把这一思想主张发展到新的水平，把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与移风易俗、增进社会文明结合在一起，以西方的科学文化启迪人们的头脑，以资本主义风俗习惯改造中国封建的风俗习惯，以真正达到他“善辅国政，以新民德”的目标。

要发展科学文化，并进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有高度的社会文明，所以洪仁玕在他的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中，专门有一节（《风风类》）阐述移风易俗，促进社会文明的问题。他提出：中国封建旧文化、旧风俗，如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吉凶军宾，琐屑仪文，养鸡斗蟋，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皆小人骄奢之习”。这“骄奢之习”“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虽“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它不能直接促进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只有那些代表着当代科学技术水平的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等等，才是真正的“有用之物”，“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我们之精，此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主张“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们民”，并发展对外贸易，引进科学技术，同时移风易俗，开办医院、礼拜堂、算学馆、四民院、四疾院等，以“厚风俗”。

把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与增进社会文明结合在一

起，并通过移风易俗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这是洪仁玕思想的一大创举。它不仅把十九世纪中期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潮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且为后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大讲西学、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主张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他的这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移风易俗的思想主张大都是切实可行的。

魏源经济思想

魏源是站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上最先具有对外开放意识的、爱国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发生剧烈变动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承先启后的代表人物，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开拓者。他的经济思想反映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开端的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成为尔后洋务派创办新式工业的理论先导，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直接前驱，为拉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序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新旧历史交替之际站在历史前沿的经济学家，魏源的经济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魏源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

魏源的进步经济思想是建立在他的进步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他非常重视《公羊春秋》、《周易》和《老子》中的变易思想，这种思想经过他的推衍阐发，成为他的社会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础。

关于魏源的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

（一）认识论的唯物倾向。

1. 行是知的来源。知和行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魏源主张先行后知，不行则不知。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注：魏源：《学篇二》。）他强调“及之”、“履之”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一定要主体与客体相接触才能获得；没有行则不可能有知；在知行关系上，行是知的来源和基础。

2. 批判“生而知之”的先验论。魏源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进行了批判，否认有先天的、超经验的所谓“知识”。他指出：“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坐而待旦？文王何以忧患而作《易》？孔子何以假年而学《易》乎？”（注：魏源：《学篇三》。）他指出封建社会历来尊为偶像的三位“圣人”的知识也是经过长期刻苦学习而获得的，而决不是“生而知之”。

3. 批判汉学和宋学脱离实际。在清政府大力倡导的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下，当时的汉学家醉心于对古代经史典籍进行考证，宋学家则只读心性书，挖空心思琢磨程朱义理，都不敢正视社会现实问题。魏源斥责宋学脱离实际，“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注：魏源：《学篇一》。）同时抨击烦琐的专注于训诂的汉学，指出它只能“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注：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他呼吁关心国事和民众疾苦，提倡“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注：魏源：

《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和“以经术为治术”(注:魏源:《学篇九》。)的正视现实问题的学风。

(二)辩证法的因素。

魏源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提出:“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注:魏源:《默觚·学篇》。)又说:“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注:魏源:《默觚·学篇》。)这就是说,天下的事物没有单独存在的,必然包含着对立的方面;而且对立的双方必然有主次之分,这样虽然包含着对立的方面,而仍然不失为统一的事物。他还观察到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及矛盾的转化,他说:“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世事、物理,包括学问,都包含着这个道理”,“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注:魏源:《默觚·学篇》。)承认客观事物中包含着矛盾,矛盾的斗争引起变化发展,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事物,这是魏源变法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进化的历史观。

魏源针对宋明理学复古倒退的观点,利用《公羊春秋》“微言大义”的方法,提出一些进化的历史观点。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于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于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于今日之物。”(注:魏源:《默觚·治篇五》。)因此,他提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为治,诬古不可语学。”(注:魏源:《默觚·治篇五》。)他痛斥那些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守旧派说:“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注:魏源:《默觚·学篇》。)他认为,不顺应历史变化而为的人是不可以“语

学”，不可以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的。

二、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经济变革主张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在以鸦片战争为契机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开始转变之际逐渐产生、发展和形成起来的。魏源的经济思想正是这一时代大变革的开端在经济思想这一意识形态领域最初的反映：魏源以传统的经济思想范畴为载体对之赋予新的解释并加以修正，为他的经济变革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本”、“末”关系的新解和修正。

“本”和“末”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对封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问题。“重本抑末”思想是自然经济形态的反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一直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到了近代初期，地主阶级顽固派仍然敌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墨守“重本抑末”的教条。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也同样视农业为“本”并主张“重本”，但是，时代的变化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主张或并不强调“抑末”。

魏源基本上也是一贯地把农业所生产的自然形态财富（“食”）看作“本富”，而把货币形态财富（“货”）称为“末富”。直到1852年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尽管他对西方国家工商业发达的情况已有了相当了解，但他竟然以美国和秘鲁来作“重本”主张的佐证。他说：“美利坚产谷棉而以富称，孛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金玉非宝，稼穡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

（注：魏源：《弥利坚国总论下》。）“重本”思想在他的具体经济改革主张中的表现是他特别强调“阜食源”即增加粮食生产，主要办法就是兴屯垦。他主张把东南沿

海的一些“封禁山”尽量开放，“许民屯垦”，尤其主张把靠封建国家赡养过着寄生生活的大量旗民，遣送到内蒙、东北去进行屯垦。

但是，魏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本”和“末”的关系上具有新的观点，乃至对“重本抑末”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正。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视“本富”，维护“末富”。在鸦片战争之前，他已把“富民”分为“有田之富民”（地主）和“无田之富民”（商人），他主张对两者都要加以保护。尽管他在坚持“重本”的一面时很重视“有田之富民”，认为他们是封建国家财力的主要基础，国家政策必须保护而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以使他们“敢顾家业”，但是，魏源“重本”而不“抑末”。在漕运和盐政问题上，他比包世臣更敢于公开地维护商人的利益。在海运问题上，他一反传统的“抑末”观点，直言不讳地把海商的利益同国计、民生联系起来。他说：“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注：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并且充分地肯定海运的优越性：“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注：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

在票盐问题上，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其“革弊”的优点是：“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注：魏源：《淮北票盐志叙》。）魏源论证了藉民营商业活动改革漕、盐“大政”优于封建官僚机构和封建垄断商业经营。他认为依靠海商运送漕粮符合天时、地利、人事发展的自然趋势，官运漕粮已势不可行，因此宣称：“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注：魏源：《海运全案序》。）

第二，修正“重本抑末”论，提出“缓本急标”论。

在鸦片战争之后，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他进一步修正了“重本抑末”论，提出了“缓本急标”的经济范畴，为他更加重视工商业和商品货币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语金生粟死，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注：魏源：《军储篇一》。）

魏源能够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缓本急标”论的提出，使他超越了龚自珍“食固第一，货即第二”和包世臣“本末皆富”的关于“本”、“末”关系的理论，从而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成为尔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工商为国本”以至“定为工国”的理论先驱，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初奠基者。尽管魏源在这里还没有冲破传统经济观念关于“本”、“末”区分的藩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缓本急标”论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过渡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津梁。

（二）“除弊”和“兴利”中发展工业的主张。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一般只是希望限制大地主阶级的兼并侵渔，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所以注重“除弊”而不强调“兴利”；但是魏源却在“兴利”中注入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新内容，开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先河。

魏源在鸦片战争前的经济主张也差不多集中于除弊方面。他说：“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而利自兴矣。”（注：魏源：《淮北票盐志叙》。）他所主张和悉心筹划的海运和票盐，其目的都是“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利国、利民、利商”，这和包世臣的“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的思想是异曲同工的。

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对“兴利”、“除弊”的提法有了变化。他说：“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注：魏源：《军储篇一》。）从表面看，他在这里讲的都是“兴利”的问题，但实际上，节用、塞患也都属于“除弊”的范围，只有开源才是“兴利”的问题。对于兴利或开源，他也只列举了别人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提过的屯垦、采金（指银矿）和更币之类。但是在编辑《海国图志》时，他终于对“兴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提出了由政府设厂并允许沿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的轮船、枪炮以及其他一些新式工业产品的主张。这种主张已经完全超出了“除弊”的范围，而且也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历来的“兴利”思想中所不曾有过的属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崭新的内容。

魏源能够提出这样新的主张，表明他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兴利除弊思想的界限，因而成为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关于兴利除弊思想的重要先导。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资产阶级改良派进一步把“兴利”提到比“除弊”更优先的地位，并且把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作为兴利的根本内容。

（三）“利国”、“利民”思想中的朦胧资本主义倾向。

“利国”和“利民”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魏源站在中小地主和商人的立场上，反对大地主和封建垄断商人的兼并掠夺。从这种立场出发，在“利国”、“利民”的问题上，他主张“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他说：“专主于便民者，民便而国亦利；专主于利国者，

民不便，而利归中饱，国乃愈贫。”（注：魏源：《元史新编》。）

对于“便民”问题，魏源的主要出发点也是“富民”，尤其是“有田之富民”的利益。他极力论证富民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上“足君”而下“养民”，全要依靠富民的力量。他说：“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伐，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注：魏源：《治篇十四》。）富民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封建国家的政策，当然就应该以保护、培植富民的力量为主要出发点；损害了富民的利益，就必然会破坏国家本身的基础。因此，他一再宣称：“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注：魏源：《治篇十四》。），“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注：魏源：《治篇十四》。）

赋税是封建国家运转的依托，当然也是大地主当权势力进行掠夺的基本手段，所有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都反对过重的赋税。魏源为反对重赋，提出了一个征税原则：国家赋税只能征收富民的一部分收入，而不应该侵害他们的财富根本。他说：“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尽不止。”（注：魏源：《治篇十四》。）他指责当时统治者的赋税，正是这种“剪韭”式的掠夺；结果破坏了纳税人的财富，也就破坏了国家自身的基础。他说：“彼贪人者，专 j u ā n @ 富民；富民渐罄，复 j u ā n @ 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注：魏源：《治篇十四》。）

在“富民”之中，魏源自然更重视“有田富民”即地主的利益。他对“有田富民”所受的国家赋税徭役的损害，特别感到痛心疾首，认为：“有田而富者，岁输